

# 新一轮改革开放 将释放新红利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改革开放处在攻坚期等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短期应通过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长期则要通过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文 | 任泽平



经过 2019 年初短暂的“小阳春”，我国经济于二季度再度进入下行通道，十年来经济波动下行寻底路漫漫。当前，内外需低迷，三驾马车疲软：2019 年 1~11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2%；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 8%，实际增速 4.9%，为 2003 年 1 月以来低值；出口负增长，1~11 月累计出口同比增长 -0.3%；财政形势严峻，1~11 月税收接近零增长，6 省市财政收入负增长，土地财政增速大幅下滑；1~11 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 -2.1%，较去年下降 12.4 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世界经济周期下行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而是内部因素，比如民营企业被误伤、被歧视、信心不足，地方政府约束多、激励少、积极性不够，部分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有些政策“一刀切”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对外开放进入行政垄断和意识形态的深水区，传统增长动力正在衰减而新增长动力尚待培育。

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都有一个主要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不能为了一头猪牺牲整个国民经济”，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财政优于货币，货币政策的关键是宽信用，长期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释放微观主体活力，重振中国经济信心。

##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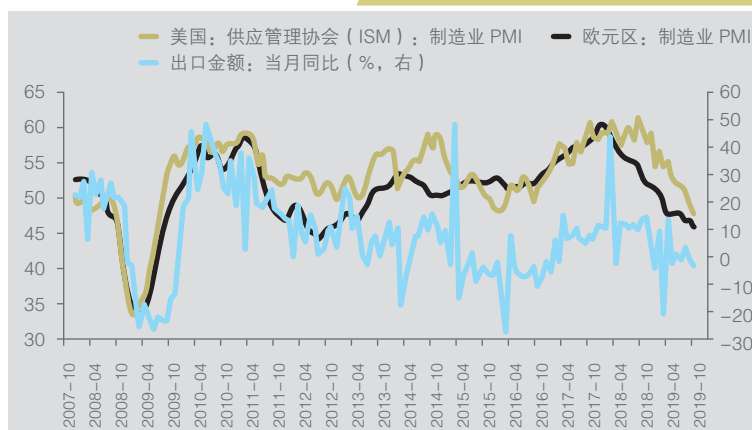
对于贸易摩擦，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中美贸易摩擦，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中国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从狭义到广义有四个层次：缩减贸易逆差、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遏制、冷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对抗。缩减贸易逆差可以通过双边努力阶段性缓解，但如果美方单方面要求中国作出调整，而不彻底改变自身高消费低储蓄模式、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美元嚣张的超发特权等根本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减，无非是类似当年美日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从日本转移到中国，未来再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在实现公平贸易的结构性改革方面，中国可以作出积极改革，这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些都难以满足美

## 中国出口放缓，美欧制造业回暖



资料来源：Wind，恒大研究院

方战略遏制中国高科技升级和大国崛起的意图。

中美贸易摩擦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减少投资限制、降低关税、保护产权、国企改革等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从合作共赢走向竞争合作甚至战略遏制，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保持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过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中美大博弈最终无非四大结局：一是，中国被遏制，美国维持世界霸权，如美日贸易战；二是，中美脱钩，形成两大对立阵营，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如美苏对峙；三是，中美合作共治，形成以中美为核心的G2集团，如德法推动欧洲一体化；四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如历史上大部分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崛起大国。

## 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

当前宏观政策选择是财政优于货币，货币优于汇率。2009年以来，地方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不断加杠杆，杠杆率较高，再加杠杆空间有限，我们处在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高点，防化风险重要性凸显。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减税降费、基建等有助于扩内需、降成本、调结构，不同于总量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目前更多是市

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最好的投机机会就在中国。

场化，且受中美贸易谈判的制约。

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支持减税和基建。

第一，适当扩大赤字，赤字率突破3%，赤字总额3万亿元，为减税降费和增加基建支出腾出空间。增加中央赤字，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元上调至3万亿元。尽快修改地方债务终身追责，允许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有资产利润上缴比例，避免税收增速下行导致“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行为。

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第六，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

建议2020年货币政策进行正常的逆周期调节，不搞“大水漫灌”，该降息降息，通过小幅、高频、改革方式降息，引导实际利率下行。疏通利率的传导机制，改善流动性分层，消除所有制歧视，纠偏房地产融资过紧，对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给予重点保障，从宽货币转向宽信用。

建议2020年房地产政策从过度收紧回归中性稳定，中央的定调是“三稳”，不是“三松”也不是“三紧”。老成谋国是时间换空间，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度收紧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过度遏制房地产合理的融资不仅加重经济下滑，而且加重经济金融风险。房地产一半是金融，一半是实体经济，是制造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链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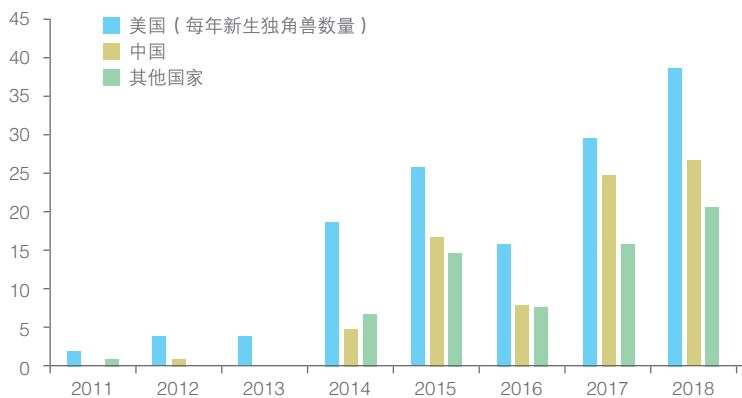
长，有必要推动改革，更多地发挥其实体经济的功能，回归居住属性和制造业属性。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放水刺激到过度收紧。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利用时间窗口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关键是金融稳定和人人地挂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议 2020 年供给侧改革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纠偏部分地方部分部门“一刀切”“运动式”做法，提振企业家信心。2016 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政令畅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改革方式需完善，部分领域改革不彻底，需要更好地把握好政策的“度”，防止“运动式”“一刀切”，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执行层面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又红又专。

## 开启新时代新周期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中美新经济独角兽引领全球



改革开放处在攻坚期等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短期应通过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长期则通过改革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深化国企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落实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

三是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四是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让微观主体轻装上阵，大规模减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五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发展 PE、VC 等。

六是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企业家吃定心丸，事业都是人干的。

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最好的投机机会就在中国。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为 9700 美元，不到美国的 1/6，发展潜力巨大；2018 年中国城镇化率 59.6%，发达经济体大部分超过 80%，城镇化还有 20 个百分点空间；中国 GDP 增速 6% 以上，是美国的 3 倍；中国 14 亿人口，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 亿人规模）；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 9 亿人，就业人员超 7 亿，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 1.7 亿，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 800 多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中美独角兽企业合计占全球 70%。

在这些条件下，新一轮改革开放将释放新红利，开启新周期。E

（作者系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